信 息 与 分 析

（总第 263 期）

第 8 期

西南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本期要目

打造有灵魂的本科教育……1
建设一流大学，何不向跨国公司借把力……5
重视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10
大学生的话语权可以做更多事……11

※ 打造有灵魂的本科教育 ※

☞ 编者按：本文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教授所写，阐述了他对高等教育发展研究的一些思考。

斯坦福大学最近的一则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就读大学之前优于全球同龄人，却在本科阶段被“消磨”———在读了两年大学后几乎没有提高。而美国和俄罗斯的同龄人则取得了显著进步。

另一项运用“全美大学生学习投入问卷”(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简称 NSSE) 评估中国一所顶尖大学本科生学习成果的调研结果也显示，这所名校本科生的认知能力水平 (记忆、分析、综合、评价、应用) 较美国同类大学本科生发展缓慢。而且，随着认知目标从“记忆知识”递进到“应用知识”，该校学生的认知能力与美国同类院校学生的差异越来越大。

本科立人，本科阶段是养成宽广视野、自由人格、开阔心智的关键时期，是提升认知水平、思维能力的最佳时期。然而，我们的本科教育却没有成就如此锦瑟华年，原因何在？

本科教育应提供个性化培养方案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学生成份更加多样，学生的价值取向和教育需求更加多元，社会公众对本科教育的个性化需求日益突出。因材施教，竭尽全力提供个性化培养方案是实现“以生为本、激扬生命”本科教育的核心环节，具体包括专业设置模式、课程设置方式和教学制度体系三个部分。

专业设置：“因人而异”，注重“学科交叉”

不少海外名校，专业设置“因人而异”，注重引导学生理性选择，允许学生自主设计专业，以满足每个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如哈佛大学的 Special Concentrations、普林斯顿大学的 Independent Concentration、斯坦福大学的 Individual Designed Majors。通常，学校设有专门的教师委员会审查这些自主设计专业的合理性，审查时着重考虑学生的设计是否具有知识上的连贯性、是否平衡了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学生在标准的专业结构外寻求发展的能力以及相关学术资源是否能够满足需要。值得注意的是，选定专业的过程在这些学校多被称为“Major Declaration”或“Declaration of a Major” （大意为专业申报 ）。“Declaration”充分体现了学生在确定专业时所拥有的自主性。

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一般放在入学后 1-2 年，这便于学生通过前期课程的学习发现、定位自己的兴趣和志向，了解目标专业，理性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同时，为帮助学生自由探索各个学科领域，如果选定专业后兴趣转移，学生还能较为容易地更换专业。如新加坡国立大学规定学生最早可以在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选择专业，此后直到第三学年第一个学期都可以随时更换专业。与之相似的还有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这两所学校在提交学位候选人申请截止日期之前均可更换专业。

扩展本科生的学科视野和专业基础，对学科发展和社会变革保有高度前瞻性和敏感度，设置较多宽口径、跨学科、跨系专业，努力体现学科交叉的最新成果，也是很多海外名校在专业设置方面的共同点。例如，斯坦福大学将全部本科专业整合到人文与科学学院、工学院、地球科学学院 3 个综合性学院中，由这 3 个学院承担全部的本科教育。其中，规模最大的人文与科学学院，就包含了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历史、艺术、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数学、物理等 30 多个专业，负责学校 63%的本科教育与学位授予工作。综合性学院有利于不同学科专业间的交流和融合，为拓宽专业基础，实现全面发展提供了平台。

课程设置：应该“超越学科”，注重“拓展视野”

课程是本科教育的核心和魅力所在，凝聚着一所大学的教育理想和价值观。为实现“全人”培养目标，很多海外名校在努力优化课程结构、减少专业必修课比例的同时，更在不遗余力地打造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通识教育课程以“超越学科界线、拓宽专业基础、优化知识结构”为特点，强调广度、深度和背景，是帮助学生开阔学术视野、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的重要载体。哈佛大学、斯

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均要求通识教育课程的学分不得低于总学分的 1/3。在实现方式上，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可归纳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开设学科渗透的交叉课程。交叉课程积极探索课程整合并增加跨学科内容，使课程设置向综合化方向发展，以应对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涌现。如东京大学的基础科目课程和综合科目课程、牛津大学的联合课程 (Joint Courses)、剑桥大学的课程模块 (Options)。

东京大学的通识教育为期 2 年，分为 1 年半的前期课程和半年的后期课程，课程模块涵盖六大课程领域：思维与艺术、国际化与区域研究、社会与机构、人类与环境、物质与生命、数理信息科学。6 类课程模块各自开设基础科目、综合科目和主题科目课程，每一类课程模块由于学分要求不相同，上述 3 种课程的组合也因此存在差异。基础科目为必修课程，开设外语、信息处理、人文科学基础、社会科学基础、数理科学基础、物质科学基础、生命科学基础、基础实习、基础实验、体育运动等 10 类课程。综合科目则开设思想、艺术，国际、区域研究，社会、制度，人类、环境，物质、生命，数理、情报等 6 类课程；主题科目以专题报告和研讨课程为主。

第二类是采取跨学科选修制度并辅以“就远原则”。研究表明，以跨学科选修实现通识教育内涵的学校，其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核心是通识教育必修课。一般而言，通识教育必修课旨在帮助学生拓展学科视野，构建宽广的知识体系，学习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培养思维能力和跨学科研究能力，为创新能力的养成奠定基础。

哈佛大学通识教育必修课 (即“核心课程”) 涉及外国文学、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科学、道德推理、社会分析、定量推理等 7 个学科领域，各领域开设的核心课程数量每年限定在 10 门左右，主要安排在大一、大二进行。为保证所有学生都拥有横跨文理两大领域的知识基础，哈佛大学要求本科生在选择核心课程时遵循“就远原则”，以拓宽视野。如学习人类学的学生，可以免修社会分析领域，但必须选修科学 A 和科学 B 领域；主修生物学的学生，可免修科学 A 和科学 B，但其他领域都不能免修。与之类似，普林斯顿大学通识教育必修课涉及写作、外语、认识论、伦理思考与道德价值、历史分析、文学与艺术、定量推理、科学与技术、社会分析 9 个学科领域；但是相较于文科类学生，理科类学生不需要修读定量推理、科学与技术。

丰富多元的通识专业选修课和通识自由选修课也是体现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元素。通常，通识自由选修课涵盖了校内所有课程领域，以充分满足每个学生的兴趣及未来生活的需要。南洋理工大学的通识自由选修课程还可以选择一些国际合作项目，如国际学生交流计划、全球教育计划、海外实习计划、全球暑期学习计划等。

我们亦应明确，大学的通识教育虽有特定涵义、普遍要求，但绝不应该是千篇一律的，必须扎根于各自的文化土壤，必须充分挖掘和利用本校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形成各自的特色，建构一套符合中国大学需要的通识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以及制度规范。

教学制度设计：“灵动人性”，注重“因材施教”

教学制度体系是与人才培养的微观过程紧密相关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实施体系。科学先进的教学制度体系可适应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激发学生在学习和研究中的主动性、能动性，全面提升学生的创造性。

学院制和导师制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教学制度体系的精髓，是二者卓然于世界一流本科教育的根基所在。其要义在于，导师制深深根植于学院制之中--大学的教学方法是教授式的，而学院的教学方式是导师式的；大学为传授知识而存在，而学院的职能在于发展品格。在理念上，导师制要求导师承担大部分课程内容的讲授，负责制定和监控学生的学习计划，并以导师课论文作为导师制教学的重要载体。一方面要求论文必须具有独立见解和充分论证；另一方面，师生在每周一次的导师课上对论文进行充分讨论，为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质疑问难的精神提供了良好氛围。

与科研不同，教学包含着使命与责任。高品质的教学不仅要求教师知识渊博，更需要无私的奉献精神。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导师制的长盛不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导师们的大力支持与付出。

我们的大学应当遵循教师职业发展规律，理解教师、尊重教师、服务教师，改革现有的教师评价体系，在制度上保证科研与教学的融合，为提升教学质量开辟更广阔的天地。一方面，要改革教师晋升机制，使其与教学质量直接挂钩，建立有利于激励教师从事本科教学的保障制度，让一部分乐于、善于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发挥特长，享受应有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要打通教学管理与科研管理之间的壁垒，统一考核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增加教学绩效在考核体系中的权重，让每一位教师都能从容治学，优雅从教，赋予学生更多关怀。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心如止水，气贯如虹。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异质化、价值多元化、文明融合化的未来，让学生全面、自由、和谐发展，诗意栖居，拥有从容跑完人生这场“马拉松”的“后劲”，比赢在所谓的“起跑线”更为重要。学校与学生是彼此成全的关系，只要我们贴近心灵，用心体悟本科教育对于人生的重要性，便不难把握本科教育改革的方向。以生为本，激扬生命，是大学与学生的约定；追求有灵魂的卓越，打造有灵魂的本科教育，是我们与生命的约定。

“育人”是本科教育的灵魂

本科教育的灵魂在于“育人”，而非“制器”。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曾说过：“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支需要被点燃的火把。”

春华秋实，立德树人，用知识润泽生命，发掘生命中隐藏的灵动，成就生命的完满生长，是本科教育最有荣光的担当。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提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注重多样性人才培养，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

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不仅要直面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更要坚持文化自信、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我们应同时从中西方深厚的教育哲学思想中寻求智慧的灵光，研究、甄别、选择、融合具有现代实践价值的思想精华，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哲学以引领本科教育改革，全力打造“有灵魂”的本科教育，培养“有灵魂”的卓

越人才，帮助学生实现全面、和谐、自由发展，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最美好的年华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美国杜肯大学威廉·巴罗内(William Barone) 教授认为，美国、欧盟和中国先后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不再是只招收优秀学生和实行精英教育的地方，如何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更负责，成为主动学习者，是不同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应当践行“以生为本，激扬生命”的教育理念，“因材施教”，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赋予学生更多权力，唤醒每一个生命的内在心灵。

培养“全人”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

放眼全球，多所世界一流大学虽然办学定位和学科特色各不相同，但人才培养却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塑造“全人”。

欧洲作为“人本自由”理念的发源地，“自由教育”思想深入人心。牛津大学向来排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认为大学应提供博雅教育而非纯粹的职业训练，一直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以培养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全人”。在学问和教养之间，牛津始终将教养置于学问之前，强调学生应该首先成为有教养的人，其次才是有学问的人。剑桥大学也一贯重视理性训练和人格塑造，强调自由教育和知识本身的价值，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主动探究。

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大学也格外重视拓展学生知识结构、提升其综合能力、促进全面和谐发展。例如，哈佛大学致力于提供博雅教育，培养有教养的人；普林斯顿大学期望中的大学教育是为不同的人生做准备，而非专业培训；斯坦福大学将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学习广博知识，培养多元能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致力于提供全方位教育，培养跨学科人才。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大学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梅贻琦亦在 《大学一解》 中写道：“大学期间，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将“全人”作为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是教育应然价值的回归。这要求我们本科教育必须从工具理性、经济理性、价值理性向教育理性回归，让本科生在学期间自由探索各个领域的知识，找到自己的兴趣和人生发展方向，具备适应新环境、迎接新挑战的能力。

（《文汇报》，2016 年 09 月 02 日，第 6 版。）

※ 建设一流大学，何不向跨国公司借把力 ※

☞ 编者按: 大学和跨国公司在培养人才方面是什么样的关系？跨国公司究竟需要大学毕业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技能为企业服务？中国的大学与跨国公司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合作促进人才的培养？

当今世界，企业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其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跨国公司的崛起。

英国著名学者诺瑞娜·赫兹曾指出：“21 世纪的国际政治越来越与领土利益无关，而与经济自由和市场占有率有关。现在最大的 100 家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 20%的资产。”赫兹举例，全球前 100 大经济体中，51 个是企业，只有 49 个是国家。

可见，跨国公司已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但是，从早些年开始，国际上就有一种声音，认为我国在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特别是跨国公司所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方面存在较大欠缺。3 年前，《纽约时报》记者凯斯·布赖施撰文指出，“用西方的标准看，中国的教育方式也有点过时，似乎不适合培养企业家，或者跨国公司青睐的那些社会技能出众的管理人才。而能否大规模地培养创新人才，在高科技和新兴产业领域与世界先进国家竞争，对中国的高等学府来说，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根据笔者的调查，目前国内高校和跨国公司签署合作关系的并不少。但提及高校的人才培养，提及即将启动的“双一流”建设，我们仍然需要深入探讨以下问题：大学和跨国公司在培养人才方面是什么样的关系？跨国公司究竟需要大学毕业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技能为企业服务？中国的大学与跨国公司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合作促进人才的培养？

跨国公司和中国高校的合作呈不均衡状态

跨国公司和中国高校的合作现状如何？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曾先后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十余所主管教学、科研或人事的副校长和处级相关主管人员做了访谈，并对国内 812 位高等院校的主管教学、科研或人事的副校长和处级相关主管人员发放了问卷。

调查发现，进入 21 世纪以来，跨国公司与中国高校的合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惠普、IBM、美国德州仪器、英特尔、微软公司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合作等。但是，跨国公司与中国高教界的合作发展非常不均衡：同中国地处沿海和发达区域的合作较多，同“985”“211”高校合作较多，同中西部地区内陆地区合作的高校数量较少；同中国地方所属高校合作较少；同中国综合大学和工科类高校合作较多，同中国文科类、师范类等类院校合作较少。

根据问卷的统计结果，52.35%的部属高校和跨国公司“有，且是长期合作的”，而民办高校是 46.15，%，最低的是省属高校，仅为 17.33%；在和跨国公司“有，但只是短期合作”方面，部属高校为 40.27%，省属高校 48.44%，民办高校 38.46%；此外，有 34.22%的省属高校表示“从未与任何跨国公司有联系”，这个比例远高于部属高校(7.38%) 和民办高校(15.38%)。

大学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形式有多种，包括跨国公司在大学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创业基金；为专项科研课题提供资助；与大学设立联合实验室；联合开发教材或课程；企业委托高校对公司职工进行定向培养、培训，高校向跨国公司输出科研成果等。

无论是部属高校、省属高校还是民办高校，与跨国公司的合作项目，以设立奖/助学金占的比例较大，其次是为专项科研课题提供资助和与大学设立联合实验室；在联合开发教材或课程方面，三种类型的院校占的比例都不高；在向跨国公司输出科研成果方面，部属院校比省属院校要高出一倍，而民办高校的统计是零。

再看毕业生去向。无论是部属、省属、民办高校，无论是普通还是成人高校，毕业生进入跨国公司的比例都很低。有 7.81%的部属高校毕业生进入跨国公司的比例超过 15%，省属高校毕业生进入跨国公司的比例超过了 15%的院校仅为 1.12%。部属高校毕业生进入跨国公司的比例在 10-15%的院校仅为 6.25%，省属院校仅为 1.69%。

根据调查，中国绝大多数高校设有专门机构和负责人负责校企合作。但对跨国公司的合作进行管理的部门比较松散，一般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通常设在学校的科研部、校企合作部，或者国际合作部。绝大部分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是都是分散在院系里，由院、系、所自行联系合作事宜或者是教师/行政人员的个人行为。

在目前的国内高校中，清华大学的管理最为系统。2004 年清华大学海外项目部成立。清华大学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模式，是一种多元化的合作模式，提倡与世界著名企业进行前瞻性合作。最高级的合作模式是校级联合机构，合作年数是 5 年，合作投入起点最少 3000 万人民币，此外还有一些联盟，清华大学在不少联盟中承担着重要的工作，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北京大学 2008 年底，在科学研究部下面设立了海外项目办公室，负责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国外的政府项目以及基金会，以及部分海外企业的项目。另外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也负责国内和国外的企业合作以及技术转移的事务。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也设有专门的海外项目办公室，但专职管理人员很少。

在我们对中国高校问询“希望跨国公司通过何种方式共同培养人才？”的问题时，很多答卷者提出，希望跨国公司提供国际标准的培训项目。一位答卷者提出希望跨国公司的实验室或研究室能够吸收文科的科研人员参与项目研发，建立合作关系。

问卷调查还显示：无论是部署、省属还是民办高校，都主要希望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激励 （包括减税，经费支持） 大学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并共同培养人才。

发现“人才泡沫”现象后，跨国公司更青睐成熟踏实的学生

我们的课题组除了走访高校，课题组也对微软、甲古文、普华永道、英特尔、思艾普(SAP)、超威半导体(AMD)、塞默飞世尔等跨国公司进行了专访，并且对在北京的 30 余家跨国公司的高管和人力资源负责人员发放问卷。

跨国公司在人才招聘和使用时究竟采用哪些标准呢？ 责任心、主动性、团队精神、学习能力、适应性、专业知识、上手快、踏实稳定、创造性等都是考核的重要标准。在访谈和问卷调查中，责任心和团队精神往往被列为录取和评价最重要的标准，而创造性则放在评价标准的最末一项。其原因在于，跨国公司绝大部门属于生产、操作、程序运作、销售部门，他们更看重对事业的责任感、企业的忠诚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队的合作精神上。

除了责任心和团队精神外，许多知名企业十分重视应聘者是否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强烈的求知欲。尤其在招聘应届毕业生时，企业往往将学习能力和求知欲作为考察的重点。很多跨国公司表示，公司并非很在乎应届生是否出自名校，也不是特别强调学生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培训体系较为自信，认为只要应聘者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学习能力，那一定可以通过系统培训脱颖而出，因此，在面试中这两项考核十分关键。

一些跨国公司人事主管认为，近年来在招聘中发现“人才泡沫”现象十分严重，很多人只关注职位和薪酬，很少人能够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积累经验。还有一些名校毕业生好高骛远，缺乏务实态度。他们强调“人才过分的自信只会给企业带来不安全感，我们在招聘中注重员工的忠诚度和稳定性。”总体上看，公司当然喜欢招聘聪明的学生，但同时更欣赏成熟、踏实的学生。

国内考试与教育服务供应商“TAT 数据”作了 《2014 年度中国高校学生通用就业能力排行榜》 的调查问卷，所谓就业力即指“可雇用性”，包括言语理解能力、数字运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思维策略能力、资料分析能力五项。根据对国内 454 所高校 104930 名毕业生的抽样调查，通过定量分析，结论是：第一，大学生通用就业能力普遍不足，有待加强；第二，传统名校就业力排名没有优势。

对此，一些专家的解释是：首先，此排名依据的是每年度企业校招考试中的高校毕业生成绩，传统名校中不少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或出国深造，没有进入求职市场；其次，我国高校教育依然存在过于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缺乏实践型课程的问题。以用人单位看重的就业能力和评价标准做衡量，自然不同于传统学术型的高校排名。

有趣的是，在对跨国公司问询“为提高员工的素质，贵公司希望大学通过何种方式共同培养人才？”的问题时，回答集中在以下的方面：希望大学鼓励优秀学生进企业实习，而不是把优秀学生都绑在自己教授的实验室和项目上；通过校方和企业更多交流，了解用人需求，分享资源，给学生多创造一些接触社会和企业的机会；加强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的工作，合作课程，共建课程，共建实习实训基地，给学生以社团支持和资助等等。

人才本地化策略成为跨国公司招聘人才的主旨。由于跨国公司与本土公司对人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随着用人成本的不断增长，跨国公司人才的聘任与使用策略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即从聘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转变为聘用中国大量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将中国从生产基地逐渐变为研发基地和营销中心。跨国公司的人才本地化战略，具有双向性。从跨国公司角度来说，不仅包含对人才知识和能力的培训，而且也希望员工对企业有更强的忠诚度。调查显示，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人力资源本地化程度越高，中方员工的稳定性也越好。

当然，跨国公司非常强调人才的国际视野。国际化的公司，都强调同时开发本国市场和海外市场，而且公司的海外市场发展往往更快，人才的流动性非常强。不少跨国公司强调让本地员工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和公司文化，使他们消除中西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许多跨国公司人力主管都强调：公司看好沟通能力强，英文出色，同时眼界开阔、具有国际视野的学生。

与跨国公司合作培养人才，有助于教育体制创新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跨国公司与中国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中的合作势必进一步加强。

跨国公司所需求的高质量人才有其区别与其它就业领域的特殊性，用人特点也有别于国有企业。高等学校与跨国公司合作培养人才，可以创新和丰富人才培养模式，调整专业培训计划，有助于教育体制创新，推动高水平一流大学的建设。

加强跨国公司与中国高校人才培养合作，笔者的具体建议如下：

1、大学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是市场行为，但符合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规律，双方都要提高对此问题的规律性认识。

跨国公司是不同于本土公司的一种特殊的企业实体，它既具有一般企业的性质、作用、职能、用人标准和社会责任，也有其自身特征：国际化、侧重研发、注重与所在国的密切融合。这使得跨国公司对人才有特殊的标准和要求，同高校合作也存在着必然需求。大学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应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是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一种社会行为，也是大学的自主行为。高校要积极主动地寻求并推动这种合作。

最近，一个富有跨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就是，微软公司出资 4000 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推动清华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合作在美创建的全球创新学院。该学院倡导全新的国际化教学模式，通过营造一个全方位的、与项目研究相结合的教学环境，在学生和教师、高科技企业和大学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共同解决可持续发展等各类全球性议题。学院将邀请全球大学和企业的优秀学者、研发人员参与，同时开设中英文课程，搭建具有多元文化优势的开放性教育和科研平台，培养全球经济发展和科研创新急需的综合人才，为中西文化融合互补、高端合作探索新模式。

2、政府要制定引导促进大学与跨国公司加强合作的法规。

近些年来，西方学者从研究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过渡到研究大学-企业-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亨利·埃茨科威兹移植并借用生物学的概念，将这三者的关系用三螺旋理论加以界定和解释。

三螺旋理论是利用一个螺旋型的创新模型，描述了在知识商品化的不同阶段，大学、产业和政府三方在创新过程中以经济发展的需求为纽带联系起来，相互作用，密切合作，使三种力量交叉影响，促进整体协同发展。三螺旋理论强调的是大学、产业和政府间的合作关系，其中关键的是，在公共与私立的、科学和技术、大学和产业之间的边界是流动的。

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和相应制度，更没有高等教育机构和跨国公司之间关系的法律规章。现在已有专家建言，要尽快出台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明确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学生等各方面权责，完善相关财政、税收、金融政策，为校企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在这方面，美国的相关做法值得借鉴。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密切企业与大学合作关系的政策法规，还引导和直接拨款资助大学、研究机构进行技术创新的高科技计划外，通过诸如“大学-工业合作研究计划”之类的产学研合作计划，以经费匹配为纽带，吸引企业家增加对研发的投入，多渠道地筹集产学研合作项目的资金，加强对人才的培养。

3、大学与跨国公司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合作是多方位的，但重点要落实到课程改革层面，帮助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

目前许多高校在课程设置上，教学内容较为陈旧，无法适应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所以，大学与跨国公司的密切结合，要落实到课程改革层面。在课程编制与教学中展现某一领域的经典基础理论，展现该领域的科技发展动态、重大科研成果，展现跨国公司研制出的国际先

进核心技术，并用先进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地把握这些教学精品的精髓。精品课程的编制与讲授一定是一流的教师和一流跨国企业专家的共同参与。
（《人民日报》，2016 年 09 月 09 日，第 6 版。）

※ 重视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 ※

前不久，在国内某大学听美国杜肯大学伯隆教授讲座，他的报告有这样一段开场白：“请各位看我的 PPT 第一页，上面是美国著名的十所大学，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这些大学有一个最主要的、共同的优点，请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台下的老师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起来。

“都是世界最有名的大学”，教授摇头；“科研水平都比较高”，教授又摇头;“都很国际化”，教授继续摇头；“历史都很悠久”，教授还是摇头;“拥有最好的学生”，教授有些叹气；“都是私立的”，教授还是不吐口；“都很有钱”，教授看来有些绝望了……

最后，只好由伯隆教授自己回答。他说：“这些学校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拥有最好的本科教育，都非常重视教学。一个大学对待教学和本科教育的态度，标志了其成熟水平。”伯隆教授的回答超出了大多数听众的想象。

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重视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一流大学具有重建本科教育的引领作用。

近些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恐怕就是一流大学以及由此“衍生”的大学排行榜。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颁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文件，一流学科又进入了大学人的视野，并且其重要性似乎开始超越一流大学的概念。从关注一流大学转向一流学科，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但由于大学在社会组织体系中的独特性，仅仅强调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还远远不够。或者说只是从一流学科的角度解读和建设一流大学，只能表明一流大学的建设还‘在路上’，依然保留着明显的‘急功近利’的痕迹。”邬大光说。

邬大光强调，因为在大学的各种使命中，只有一项任务不能被社会其他组织所取代：那就是本科教育。因此，在“双一流”建设前行中，如果缺失了一流本科教育，就很难说是一流大学，更难说是成熟的一流大学。这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

从世界范围内看，一所大学之所以称得上一流大学，除了在科研上取得巨大成就之外，让世人记住这所大学更多的是学校培养的杰出校友。

斯坦福大学报告称：该校师生和校友创建了 2400 多家企业，组成一个斯坦福大学的学子集团，其中包括了思科、谷歌、惠普等大型企业，2008 年在“硅谷 150 强”中创造总收入共达 2250 亿美元。

也正因为如此，世界一流大学基本上要从全球招收优秀的学生，以确保大学的内在创新活力和可持续发展。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当科研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决定大学综合实力的不是科研的竞争力，而是人才培养的竞争力，特别是本科教育。

但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大学职能的不断增加，本科教育作为大学的根，出现了根基动摇的现象。

“尤其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以来，在社会外部的压力下，以‘科研为导向’的大学发展思路日趋盛行，大学的发展轨迹开始‘跑偏’。”邬大光说。

“在比较中外高等教育发展时，我时常会感到，无论在观念、价值判断或者实践层面都存在落差或差异。”邬大光说。比如，国外大学对于质量保障已经进入一个标准化、精细化阶段，对于质量的关注已经从传统技术标准进入到一个更为深层的质量文化层面。相反，国内大学对于质量保障还处于粗放式管理阶段。

从一流大学走向成熟的大学需要时间，需要模仿，需要常识，更需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说：“一所大学的成熟至少需要 200 年。”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用了近 800 年，美国的哈佛、耶鲁大学用了 300 余年。

邬大光强调，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起步晚，对一流大学的认识和了解比较滞后，我国的本科教育诸多方面也需要重建，其中包含了教育理念、教学观念的重建，教学空间、教学技术、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的重建。这些重建背后的实质就是要回答两个最为基本的命题：“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

（《科技日报》，2016 年 09 月 07 日，第 5 版。）

※ 大学生的话语权可以做更多事 ※

公众允许大学生使用独特的话语权，是因为人们希望通过大学的进步，实现社会的进步。这也是关于大学的“小问题”引发广泛社会讨论的原因。

正值开学之际，复旦大学一名大三学生撰写的题为《复旦学子呼吁：请给我们 700 米通往复旦的“坦途”！》的文章，引发了人们的关注。文章称地铁站和复旦校园之间的路况极差，非常不便于学生拖着行李箱往来。作者还呼吁，通过众筹资金的方式修行李通道。上海市杨浦区建交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计划明年该路段将整体改造，人行道亦将重新铺设，不会再有这种情况。（澎湃新闻网 9 月 6 日）

文章传播后，有观点认为复旦学生太“矫情”了。根据网上传播的图片看，文中提到的 700 米长的路并非不堪，值得诟病的只是不平整的人行道。开学、放假前后，在这样的人行道上拖行李箱的确不太方便，但只有几天而已。而且，这样的人行道在上海还有很多。因此，有评论指出，复旦学生的“格局应更大一些”，不要老盯着门前一亩三分地，更不能不恰当地使用自己的话语权。

不容否认，大学生特别是名校学生拥有自己独特的话语权。很多人眼中的“小事”，如果有名校学生发声，很可能成为新闻事件。近到中山大学因校园改造欲搬离一家修鞋铺，远到北京大学拆除“三角地”海报栏，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普通市民身上，根本不会引起任何

公共关注，但是事关大学生，立刻在舆论场激起波澜，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轰轰烈烈的大讨论。

由于大学生和一些学者的介入，一些校园问题经常上升到学理层面。比如，大学与周围社区的互动，大学推动城市文明，开放的大学精神，等等。这也是大学生使用话语权时的一大特点，他们能够巧妙地将具体诉求与宏大的理论结合起来，让“小事”不再是小事。通过这种方式，大学生也实现了话语权的强化。

公众允许大学生使用独特的话语权，是因为人们希望通过大学的进步实现社会的进步。这也是关于大学的“小问题”引发广泛社会讨论的原因。但是，如果大学生没能有力地回应社会的这种期待，就会让公众失望，甚至被指责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复旦学生呼吁修路的问题也出于此，人们显然更期待大学生将修好一条人行道的呼吁转化对整个城市人行道的关注。遗憾的是，原先的呼吁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的确，哪怕只是关注一条路，大学生也能说出很多宏大主旨，还能拿出“众筹资金”这样让人眼前一亮的方案。这固然是大学生合情合理的权利。然而，当诉求得到满足，社会关注也转到了别的方向，大学生是不是应该继续坚持对同类问题的关注呢？如果崇高的目的和高深的理论最后不过是满足了自己小小的一点要求，被指责为“不够大气”好像也不算冤枉。

值得赞许的是，许多大学生正在把关注的触角伸向社会，或者寻求关注校园与关注社会的结合点。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绘制“校园性骚扰地图”，中南大学学生花 3 年时间调研城管与小贩关系，这些大学生使用话语权并获得公众关注的案例更受社会认可。

很多时候大学生关注社会问题，没必要用呼吁式的文告来吸引公众注意力，从学术本能出发，用研究性的视角关注社会问题，更符合大学生的身份。

人们赋予大学生独特的话语权，希望大学生用话语权做更多的事，从对“小事”的关注转向对普遍问题的解答。这是一种理所应当的期待。

（《中国青年报》，2016 年 09 月 08 日，第 2 版。）

主　　编：闫月勤

责任编辑：李京肱　张　爽　郭海霞

办公室地址：犀浦校区综合办公楼 408 室　　联系电话：66367103　66367042

电子邮箱：skb@swjtu.edu.cn